

# 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留用的日籍師資

歐素瑛

## 摘要

師資向為學校推動教學與研究之主力，關係大學的發展方向，厥為學校命脈所在。戰前臺北帝國大學之師資絕大多數均係日本人，結構頗具特殊性。戰後國民政府來臺接收後，首先即需面對棘手的師資問題。除擴大登用臺籍學者、延攬中國大陸學者來臺外，因部分師資一時羅致不易，為免教學工作突告中斷，不得不留用部分日籍教職員，成為最初延續臺灣大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之主力，深具特殊的時代意義。然而，大學當局這樣的人事安排是否妥善？是否符合校內、外各界的期待？同時，校長在師資任用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各學院留用日籍師資之狀況如何？整體師資結構和質量有何變化？而日籍師資於留臺期間有何貢獻？其生活處境如何？留臺意願有無變化？在在均為戰後初期臺灣大學「再出發」過程中必須深入探討之課題。

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根據臺灣大學校史檔案、政府公報、統計要覽、個人回憶文字，以及報章雜誌等資料，深入觀察 1945 年以迄於 1949 年臺灣大學多數留用日籍師資返日期間之接收與整編、師資部署，又以考古人類學研究為例，探討日籍師資之教學與研究成果，以及其生活、工作處境等，藉此瞭解臺灣大學留用日籍師資在時代變局與政權轉換過程中之經歷及處境，略觀臺灣大學學術系譜連續與斷絕之一面。

**關鍵詞：**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留用、日籍師資

## The Japanese Teachers That Were Kept for Employment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45-1949

Su-ying Ou\*

### Abstract

Teachers are presumably the major force in steer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at school, the guidance of school development, and the spiritual center of the school.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teachers of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were mostly Japanese. After World War II whether these teachers should stay or not became a tough question fo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ried to invite scholar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to employ Taiwanese people as teachers at the university, there were not enough of them to replace all the Japanese teachers within the short tim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 number of questions emerged: Was it proper to make such replacements? Were the new teachers good enough in the eyes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people? What was the role of the principal in the new arrangement? How many Japanese teachers were retained? How did the structure and the quality of the faculty change? What contributions did the Japanese teachers make? How did they manage to survive in the new situations? How about their willingness to stay?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etention and the re-structure of the Japanese teachers during 1945-1949 on the basis of the document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overnment bulletins, statistics, personal recounts, and other materials. Besides, we also try to study the Japanese teachers' accomplishments in archeology and anthropology. By studying their life and problem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tinu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Japanese teachers'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general

---

\* Associat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at that university.

**Key words:**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 Wa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tention, Japanese teachers

## 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留用的日籍師資\*

歐素瑛\*\*

### 壹、前言

師資向為學校推動教學與研究之主力，關係大學的發展方向，厥為學校命脈所在。臺北帝國大學自 1928 年 3 月成立以來，即居於臺灣學制結構之頂端，不但設備力求完備，師資素質亦堪稱良好，惟其師資絕大多數均係日本人，臺籍僅有教授一人、助教授一人，師資結構頗具特殊性。<sup>1</sup>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結束在臺 51 年統治，國民政府隨即來臺進行接收和整編工作。其中，臺灣大學經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派員接收後，除積極推動學校的更名、改制工作外，在師資任用上，為因應過渡時期教學與研究之需要，除擴大登用臺籍學者、延攬中國大陸學者來臺外，因部分師資一時羅致不易，為免教學工作突告中斷，不得不留用部分日籍教職員，成為最初延續臺灣大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之主力，深具特殊的時代意義。

另一方面，據官方表示，臺灣於日治時期本乎差別待遇原則設計的教育制度，在教育目標、師資、課程等形式與內容方面均呈現特殊性，致使戰後能勝任大學教職之臺人相當有限，而中國大陸正值國家復員之際，需才尤急，加以交通不便、待遇不高，願意來臺者不多，「師荒」問題相當嚴重。為延續教學、研究於不綴，留用日籍師資實有其現實上的需要。然而

---

\* 本文承蒙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2 年 12 月 9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3 年 2 月 24 日。

\*\* 國史館協修

<sup>1</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5 期（民國 82 年 9 月），頁 154-156。

大學當局這樣的人事安排是否妥善？是否符合校內、外各界的期待？同時，校長在師資任用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什麼樣的功能？各學院留用日籍師資之狀況如何？整體師資結構和質量有何變化？而日籍師資於留臺期間有何貢獻？其生活處境如何？留臺意願有無變化？在在均為戰後初期臺灣大學「再出發」過程中必須深入探討之課題。

近年來，有關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已有頗多研究成果，或探討日治時期臺灣高等教育之演變與發展；或由殖民地學制的變革，考察臺灣的教育政策；或進一步檢驗其特殊學術研究成果等，<sup>2</sup>不一而足。相較之下，有關戰後初期臺灣大學之研究成果仍然寥寥無幾，對其師資之探討亦仍十分有限，其中，曾士榮的碩士論文〈戰後臺灣之文化重編與族群關係－兼以「臺灣大學」為討論例案（1945-1950）〉，係由戰後臺灣之文化重編和族群關係的角度，剖析臺灣大學之精神和學術定位、制度面及人事面之變革，偏重組織、制度的接收和整編之探討，對日籍師資狀況並未述及。所澤潤：〈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の成立と組織の繼承－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からの連續性を探る〉一文，係根據戰後初期臺灣大學出版之教職員錄、教員名冊等人事資料，說明戰後臺灣大學醫學院師資與戰前有著極高的連續性。李東華：〈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1945-1950）－羅宗洛接收時期〉一文，則係根據羅宗洛個人回憶錄及校史資料，說明其如何推動臺灣大學的接收工作及人事部署，對留用日籍教授問題亦有著墨，惟僅彙整羅氏個人回憶資料，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留遣政策、社會輿論看法及日人處境等全未觸及，有其不足之處。<sup>3</sup>

<sup>2</sup>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25期，頁143-157。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3年3月，三版）。許進發：〈臺北帝國大學的南方研究〉，《臺灣風物》，49卷3期（民國88年9月）。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年4月。

<sup>3</sup> 曾士榮：〈戰後臺灣之文化重編與族群關係－兼以「臺灣大學」為討論例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6月。所澤潤：〈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の成立

有鑑於此，本文擬在前述研究基礎上，根據臺灣大學校史檔案、政府公報、統計要覽、個人回憶文字，以及報章雜誌等資料，深入觀察 1945 年以迄於 1949 年臺灣大學多數留用日籍師資返日期間之接收與整編、師資部署，又以考古人類學研究為例，探討日籍師資之教學與研究成果，以及其生活、工作處境等，藉此瞭解臺灣大學留用日籍師資在時代變局與政權轉換過程中之經歷及處境，略觀臺灣大學學術系譜連續與斷絕之一面。

## 貳、大學之接收與改制

1928 年 3 月成立於臺北市南端富田町臺北高等農林學校內之臺北帝國大學，以其位於日本帝國的南方邊陲，配合南進政策之推動，致力於華南、南洋地區自然和人文的研究和開發，並在大學設置之學術研究體制中清楚呈現。最初大學設有文政學部和理農學部，其中，文政學部分為哲學、史學、文學及政學四科，理農學部分為生物學、化學、農學、農藝化學四科，修業年限 3 至 6 年，採講座制度，初有 35 個講座，之後續有增加。文政學部專研臺灣、華南及南洋的民情政理，各講座均係以臺灣為中心進行研究者，土俗人種學如此，心理學著重民族心理學，言語學亦多以華南、南洋語言為教材，倫理學關懷之重點在於整個東洋，政治學、經濟學等亦以東洋之資料作說明等。理農學部則係以理輔農，以研究自然科學、開發臺灣之熱帶、亞熱帶農業為目的。<sup>4</sup>

1936 年 1 月，大學當局鑑於臺灣的氣候風土異於日本國內，開發之際有待於醫事衛生之處甚多，除羅致學識經驗豐富之醫學者來臺從事熱帶醫

---

と組織の繼承—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からの連続性を探る〉，《東洋文化研究》，第 2 號（2000 年）。李東華：〈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1945-1950）—羅宗洛接收時期〉，收入周樑楷編：《結網二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 年 7 月）。

<sup>4</sup> 松本巍撰，蒯通林譯：《臺北帝國大學沿革史》（臺北：譯者，民國 49 年），頁 6-7。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5 期，頁 153-154。許進發：〈臺北帝國大學的南方研究〉，《臺灣風物》，49 卷 3 期，頁 22-27。

學研究外，為謀醫療設備之完整，乃以臺北醫學專門學校及臺北醫院為基礎，創設醫學部，修業年限 4 至 8 年。1939 年，增設附屬熱帶醫學研究所。迨至 1942 年，因應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乃將理農學部分為理學部及農學部，並於翌年增設工學部。其中，理學部分為化學、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四科；農學部分為農學、農業經濟學、農業土木學、農藝化學及獸醫學五科；工學部分為機械工學、電氣工學、應用化學及土木工學四科，講座亦增為 114 個。之後，復於 1943 年分別設置以文政學部學者為中心的南方人文研究所，以及以農學部和理學部學者為中心的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著重對臺灣、華南及南洋資源的開發，以作為日本帝國南方研究的前進基地。<sup>5</sup>在臺灣總督府的經費補助下，該校之相關學術研究無不與日本政府之政策密切配合，研究成果亦往往成為總督府與日本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而其師生比率則呈現教師多、學生少之特色，教師數平均高於學生數的 60% 以上，反映出其以學術研究為主之特質，為一所兼具殖民性與近代性的「殖民地大學」、「國策大學」。<sup>6</sup>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結束在臺 51 年的統治，臺北帝國大學因政權轉換而面臨接收和改組的命運。總長安藤一雄於 8 月間即收到總督府文教局解除學生警備召集之來函。10 月，安藤再度收到文教局來函，要求大學方面準備教職員名簿、財產目錄、會計帳簿清冊、公文書目錄、工作報告及附屬機關名簿等移交接收之必要文件。對於戰爭突然宣告結束，

<sup>5</sup> 〈南方人文研究所：參考書綴〉，《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54。  
〈南方人文研究所：統計報告〉，《臺灣大學校史檔案》，檔號：258。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5 期，頁 153。吳文星、陳舜芬等：〈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亞洲大學的發展—從依賴到自主》（臺北：師大書苑，民國 79 年），頁 345。許進發：〈臺北帝國大學的南方研究〉，《臺灣風物》，49 卷 3 期，頁 39-52。

<sup>6</sup> 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發展看臺北帝國大學的設立〉，《臺灣近代史研究》，頁 149-175。吳文星、陳舜芬等：〈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亞洲大學的發展—從依賴到自主》，頁 345。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頁 304。

校內教職員除瞭解情勢發展，亦力求自保。其中，文政學部長世良壽男曾於是月 31 日召開部內會議，商討辦理接收事宜及接收後人員之處置，並謀增進部內教職員福利等。<sup>7</sup>11 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會計處函請總督府文教局轉知臺北帝國大學總長，以為編列預算及接收後學校組織改革上之需要，要求大學方面緊急造具學校現任教職員之官等、俸給、姓名及擔任學科等名冊送處，以利移交工作的進行。<sup>8</sup>大學方面均能於期限內辦妥，靜待中方接收人員之到來。

國民政府指派教育部臺灣區教育復員輔導委員會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共同接收臺北帝國大學，任命時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之羅宗洛為接收主任委員並代理校長，與蘇步青、陳建功、馬廷英、陸志鴻、杜聰明、林茂生、范壽康、趙迺傳等接收委員組成校務委員會，掌管接收的行政大權。<sup>9</sup>上述接收委員均係留日學者專家，對於日本學制均有相當的瞭解，尤其主任委員羅宗洛早年曾留學日本達 13 年，獲北海道帝國大學農學博士學位，對於日本學制及學術研究風氣自然有相當深刻的認識。<sup>10</sup>奉命之初，羅氏曾與教育部長兼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訂下「完整接收、避免損失、立即籌備復課、可暫留日籍教師、暫時一仍舊慣」之約定，以期辦成「與北大、清華、浙大、中大並列的著名大學」，<sup>11</sup>因此，羅氏等人於 10 月 17 日抵臺後，隨即聽取在大學任教之臺籍人士與學生之報告，並囑日本當局準備辦理移交。11 月 15 日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更名為「國立臺北大學」，並面交前帝大總長安藤「移交事項」一紙，茲錄其內容如下：

<sup>7</sup> 〈教務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61。

<sup>8</sup> 〈文政學院會計往復書類、豫算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22。〈文學院教務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36。

<sup>9</sup> 〈接收帝大任命委員〉，《民報》，民國 34 年 11 月 3 日，版 1。

<sup>10</sup> 黃宗甄：《羅宗洛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 年 4 月），頁 501-506。

<sup>11</sup> 羅宗洛：《羅宗洛回憶錄》（上海：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2003 年），頁 29。李東華：〈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1945-1950）—羅宗洛接收時期〉，收入周樑楷編：《結網二編》，頁 462。



- 一、凡印章、文卷、職員名冊、經費、現金、簿籍、圖冊、財產、官舍、車輛及其他公物，應分別列冊，繕送四份，交由特派員點收。
- 二、總長應於移交總冊上簽名蓋章，各部長、各教室主任、各課長及保管負責人員，應於各該移交冊上分別簽名蓋章，並承特派員之命，暫負保管之責任。
- 三、總長以下各級服務人員，在去留核定以前，仍應照常服務，不得擅離職守。
- 四、在新校長頒發聘書以前，本大學徵用日籍人員，暫依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徵用日籍員工暫行辦法第三條辦理之，附錄原條文如下：  
「本署暨所屬各機關，徵用日籍各種行政人員，其原任敕任職務者，暫以諮詢員派用，原任奏任職務者，暫以服務員派用，原任判任職務者，暫以助理員派用。」  
前項諮詢員、服務員、助理員，各得分為甲、乙、丙三等，但原係擔任主管職務者，在未派定人員接充前，得仍以其原名義暫派代理。
- 五、教授、助教授、講師、助手暫仍舊稱。
- 六、自今日起，各部分別點收，在點收期內，應須照常上課。<sup>12</sup>

安藤即交出官印 85 顆、移交清冊 65 冊。另由教授杜聰明負責接收醫學院及附設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及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等。<sup>13</sup>要言之，在日方之充分配合及臺籍教職員之協助下，接收移交工作頗為迅速而順利。12 月 1 日，羅氏正式受命為臺北大學校長。

之後，經行政院決議及 12 月 15 日教育部令，於 1946 年 1 月再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由教育部直接管理，並任命羅宗洛為首任校長，陳建功

<sup>12</sup> 〈移交事項〉，《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

<sup>13</sup>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第 2 輯（臺北：高雄醫學院杜聰明博士獎學金委員會，民國 53 年 6 月 16 日），頁 9。黃得時：〈從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況〉，《臺灣文獻》，26 卷 4 期、27 卷 1 期合刊（民國 67 年 3 月），頁 239。

為教務長，陳兼善為總務長。<sup>14</sup>總計接收大學行政體系庶務、會計、學生等3課，教學體系文政學部、理學部（含植物園）、農學部（含農場）、工學部、預科，附屬醫學專門部、附屬圖書館、熱帶醫學研究所、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含海南島榆林實驗所），共115個講座，預科、大學院及南方人文、南方資源科學及熱帶醫學等3個研究所，其中，專任教職員有1,416人、兼任198人、大學生863人、預科生586人、醫專生318人（臺籍351人），<sup>15</sup>並接收圖書館藏書474,289冊。<sup>16</sup>

接收之後，臺灣大學即根據中國大學法之規定，進行學校組織與制度之改造工作。首先將各學部改稱為學院，原有之文政、理、農、醫、工五學部則改為文、法、理、工、農、醫六學院，共28學系，並將預科改為大學先修班。接著，修業年限除醫學院由4年改為5年外，餘均由日制的3至6年改為4年，與中國大陸各省的大學一致。<sup>17</sup>其次，又將相關的講座分別合併，設置「系」或「科」，亦即由原來學術掛帥的講座制度，改為以教學為優先之院系制度，學系取代講座成為大學的基本單位，在教育制度和內容上，呈現出不同風貌。講座制係仿自德國，在講座制之下，每一位擔任講座的教授均各有其研究室和相關的圖書儀器等設備，不但擁有豐沛的資源及自主權，且得選舉學部長及大學總長，充分顯示「教授治校」的

<sup>14</sup> 〈設立國立臺灣大學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62/1501。〈國立臺灣大學布告〉，《臺灣新生報》，民國34年12月26日。陳明哲編：《榮耀與分享：臺大創校六十週年特刊》（臺北：臺大創校六十大慶籌備會，民國77年11月15日），頁26。

<sup>15</sup> 〈授業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36。〈文政學院會計往復書類、豫算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22。〈本省最高學府，臺灣大學現況〉，《臺灣新生報》，民國35年5月11日。

<sup>16</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臺北：編者，民國34年12月）。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概況》（臺北：編者，民國36年4月），頁94。〈兩年來圖書館工作簡報〉，《臺大校刊》，第4期（民國36年11月15日），版3。

<sup>17</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概況》，頁94。〈臺大各講座改編，定為六學院制度〉，《民報》，民國34年12月16日，版1。

權力機制。戰後接收以後，校長羅宗洛認為以講座為單位，不但設備重複而不經濟，且易造成「群雄割據」之局面，而且各講座教授除非退休或停職，否則參與工作之優秀青年無法取得教授之職位，在在皆令接收當局認為有實施改革的必要，然為了承繼原有之學術研究風氣，仍同意各講座得以「研究室」之名繼續存在，暫時採行具過渡色彩的「混合學制」，以「用其長而捨其短」。<sup>18</sup>當時除醫學院外，全校 24 個學系中，共設有 84 個研究室，試圖藉此延續原有之學術研究風氣，<sup>19</sup>成為往後臺灣大學學術研究風氣延續的重要關鍵。

同時，大學當局為培植科學及建設人才起見，亦積極擴增、充實各學院，經呈奉教育部核准，於 1947 學年度於文學院內增設外國語文學系，理學院內增設數學、物理兩學系，農學院內增設農業化學系，且為了配合社會實際需要，將法學院附設之十種專修科改併為普通行政、社會行政、財政、會計銀行、工商管理、國際貿易、商業等七專修科等，大學先修班則奉准停辦。<sup>20</sup>翌年，經教育部核准設立熱帶醫學、植物、農業化學、農業生物、電機工程，以及醫學院內之生理學研究所、病理學研究所、預防醫學研究所、內科研究所、外科研究所等十種研究所，大學當局決定暫時先設立植物學、農業生物學、農業化學及熱帶醫學四個研究所，並自 1948 學年度開始招生。此項研究生須研究二年以上，經考試合格及教育部審查

<sup>18</sup> 羅宗洛：〈今後之臺灣大學〉，《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5 月 12 日。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概況》，頁 1-4。邱景墩、陳昭如：〈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 年 4 月），頁 4。曾士榮：〈戰後臺灣之文化重編與族群關係—兼以「臺灣大學」為討論例案（1945-1950）〉，頁 138-142。

<sup>19</sup> 吳文星、陳舜芬等：〈臺灣高等教育的發展〉，《亞洲大學的發展—從依賴到自主》，頁 347。

<sup>20</sup> 〈臺大各學院增添學系〉，《臺灣新生報》，民國 36 年 9 月 27 日。〈培育人材，各學院增設學系，十種專修科改併〉，《臺大校刊》，第 1 期（民國 36 年 10 月 1 日），版 2。

核准後，得授予碩士學位。<sup>21</sup>1949 學年度，復於文學院內增設考古人類學系，在理學院內增設心理學系及醫學預科。<sup>22</sup>

在校產的接收與整編方面，臺北帝國大學大部分校舍完成於 1931 年至 1935 年之間，醫學部校舍則完成於 1937 年至 1942 年之間，這些校舍和房屋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均曾遭到轟炸，損壞甚巨，圖書、儀器、設備亦多數散逸，亟待整理。戰後首任校長羅宗洛任內雖已完成初步接收工作，然受限於經費，不得不因陋就簡，情況十分困窘。迨至第二任校長陸志鴻時始完成進一步的整編工作。陸校長於 1946 年 8 月接任之初，即要求各院館所依據「接收國內日本產業賠償我國損失記賬辦法」，將接收財產造冊送會計室，以憑入帳，凡購置物品、修繕工程均須經總務處驗收保管組驗收始得付款。11 月，又規定所有各學院及附屬各單位一切校產一律歸大學當局所有，並以其目前存放使用地點為原則，分別由各單位主管事務人員負責整理，各單位多餘之財產，應報請校本部統籌調整分配使用。12 月，學校正式組織「校產清理委員會」，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並依據「校產清理辦法」，由各單位、各學系直接進行調查，並將調查表送由各該單位主管事務人員彙轉來會，以憑辦理，為學校重建工作奠定良好基礎。<sup>23</sup>

1948 年 6 月，陸校長請辭獲准，由莊長恭繼任校長。同年年底，大學當局復重行修訂「校產清理委員會組織規程」及「校產清理辦法」，規定清

<sup>21</sup> 〈第十二次校務行政會議通過醫學院設立五個研究所〉，《臺大校刊》，第 3 期（民國 36 年 11 月 1 日），版 1。〈下學期開始招考研究生〉，《臺大校刊》，第 7 期（民國 37 年 1 月 1 日），版 4。〈臺大奉准設研究所〉，《公論報》，民國 37 年 1 月 12 日。〈國立臺灣大學招考研究生簡章〉，《臺大校刊》，第 8 期（民國 37 年 1 月 16 日），版 8。

<sup>22</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概況—四十五學年度》（臺北：編者，民國 45 年），頁 2。

<sup>23</sup> 〈華南人文研究所：發令通知簿、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39。〈文政學院廳用備品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26。〈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47。

理校產在該會主持下，以兩個月為限，由各級單位主管分層負責清理，待清理完畢後，即交由總務處保管組接管，<sup>24</sup>使得校產的調查、清理更趨於制度化。然而，隨著中國大陸來臺學者的遞增，大學當局面臨嚴重的「房荒」問題，為妥善解決之，乃組織一教職員宿舍整理委員會，全權處理宿舍之等級及分配、修繕、產權之清理、設備之分配及管理，並選舉各學院委員負責推動相關工作。<sup>25</sup>12月15日，行政院同意莊校長請辭，短短六個月任期中，以延續前人作為為主，並無具體建樹。

1949年1月，傅斯年繼長臺灣大學，不但獲得教育部撥給之千噸圖書儀器及補助金，且省主席陳誠亦以戰後臺灣大學校舍從未修繕，教室、宿舍亦不敷應用，特撥舊臺幣50億元作為臺灣大學臨時修建經費，校舍因此得到部分改善。<sup>26</sup>是年4月，傅斯年於校務會議中提出〈一年半內辦好臺大〉之報告，以臺灣大學面對不斷擴張的學生人數，大一共同課程所需的大教室、實驗室及圖書儀器設備等嚴重不足，為充實一、二年級基礎學科之教學，宜優先增設大教室及學生實習室、充實校本部總圖書館及法、醫兩學院圖書分館。而且，為能逐步恢復大學的研究功能，將聘請富有教學經驗或學術貢獻之教授擔任一、二年級一般科目、加強學生實習課程及其師資，以及充實研究事項、與建設機關合作等，擬於一年半內辦好臺灣大學。<sup>27</sup>至12月9日，中央政府遷臺，大批圖書、儀器及設備紛由中國大陸

<sup>24</sup> 〈文學院總務會議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32。

<sup>25</sup> 〈解決房荒〉，《臺大校刊》，第18期（民國37年11月5日），版2。

<sup>26</sup> 〈臺大充實教學設備，獲得千噸圖書儀器〉，《公論報》，民國38年2月7日。〈臺大設備將更充實〉，《中華日報》，民國38年2月8日。〈各校寄存圖書儀器〉，《臺大校刊》，第25期（民國38年3月5日），版3。〈陳主席核撥五十億修建臺灣大學校舍〉，《公論報》，民國38年3月2日。〈省府撥款五十億元，修葺臺大校舍〉，《臺灣新生報》，民國38年3月3日。

<sup>27</sup> 〈傅斯年簽出期票一紙，一年半內辦好臺大〉，《公論報》，民國38年4月16日。〈傅斯年校長報告書全文〉，《中央日報》，民國38年4月16日，版3。〈國立臺灣大學今起舉行校務會議〉，《臺灣新生報》，民國38年4月16日。傅斯年：〈改進臺灣大學之道〉，《公論報》，民國38年4月28日。傅斯年：〈臺灣大學初步改進方案及其步驟〉，《臺灣新生報》，民國38年4月28、29日。〈第三十七學年度

遷運來臺，使得臺灣的高等教育在短期間內即有相當的進展。

整體而言，戰後初期臺灣大學在日人的充分配合及臺籍教職員的協助下，接收工作頗為迅速而順利。在學校組織與制度之更易上，則係在「中國化」的目標下，完全改易中國體制，並採行若干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措施，例如融合講座制與學院制之「混合學制」之採用即是。同時，龐大校產的處置，不但考驗著接收當局的能力，且影響未來大學的發展方向，不得不慎重為之，惟戰後臺灣大學的修建工作，始終為經費窘困、物價波動所苦，復員速度十分緩慢。值得慶幸的是，自 1945 年至 1949 年間，臺灣大學雖四度更易校長，但至傅斯年校長時，臺灣大學之相關組織與制度均告建制完成，頗有利於校務的正常運作與發展。

### 叁、大學之師資部署

在師資的部署上，由於日人長達 51 年的殖民統治，對於臺灣之影響既深且遠，國民政府來臺之後，為及早去除日人影響，迅速決定除必需之技術人員外，在臺日人宜於最短時間內遣返回國，但臺灣大學日籍師資因屬學術技術及特殊專長之日人而成為當時少數獲得留用之日人。<sup>28</sup>然而，臺人於日治時期以擔任基層技術人員為主，在日人大量遣返之後，其所遺留之工作，勢必遭逢接替無人的窘境，加以中國大陸正值復員之際，人力、物力甚感缺乏，為清理業務、維持生產事業之運作及特殊之需要等，在必需的技術人員補充之前，不得不留用日籍技術人員，以協助臺灣之接收與復員。<sup>29</sup>教育方面，除國語、國文、公民、史地課程應由國人充任外，得

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臺大校刊》，第 29 期（民國 38 年 5 月 5 日），版 4。

<sup>28</sup>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編：《臺灣民政》，第 1 輯（臺北：編者，民國 35 年 4 月），頁 197。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第 10 卷，光復志（臺北：編者，民國 41 年 6 月），頁 48-49。

<sup>29</sup> 〈徵用日籍員工有關案卷〉，《臺灣省臺中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19/066-1。

酌量暫時留用日籍教職員，以免業務停頓。<sup>30</sup>

除上述原則外，各機關並得參酌其實際需要，釐訂日人留遣標準。臺灣大學最初係依據「移交事項」之規定，校內日籍教職員在去留核定之前，仍應照常服務，不得擅離職守，又依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徵用日籍員工暫行辦法」辦理日籍人員之徵用，而教授、助教授、講師、助手則暫仍其舊，在點收期內，應照常上課等。<sup>31</sup>接著，又以優先聘用臺人、招致國內優秀學者及留用日籍教授，事務人員除留用少數日人以資熟手外，以用本國人為原則，但是對於不到校、有軍國主義思想及行為、無留職必要之日籍教職員則一律解職等，作為其整理人事之準則。<sup>32</sup>據此，原臺北帝國大學之日籍教職員乃按工作之輕重緩急及接替之難易，分四批遣返回國，僅參照各單位特殊需要酌留一部分日籍教授，<sup>33</sup>以維持教學與研究工作於不輟。茲抄錄當時大學當局編寫之《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中所列之留用日籍教授名單如下：<sup>34</sup>

<sup>30</sup> 〈臺灣省各級學校及教育機關接收處理暫行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4年第9期。

<sup>31</sup>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秘書室編：《臺灣省日僑管理法令輯要》（臺北：編者，民國35年3月），本省法令，頁134。〈移交事項〉，《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

<sup>32</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臺北：編者，1945年12月）。

<sup>33</sup> 參見拙撰：〈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第3期（2003年9月），頁211-212。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後辦理四次在臺日人之遣返工作，第一期自1946年3月2日起至同年5月25日止；第二期自1946年10月19日起至同年12月底止；第三期自1947年4月中旬起至同年5月3日止；第四期為1947年12月。

<sup>34</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

學 院 別	姓 名			
文學院	矢野禾積	岩生成一	後藤俊瑞	桑田六郎
理學院	平坂恭介	早坂一郎	松村宗治	日比野信一
	中塚佑一	市村毅	野副鐵雄	瀨邊惠鎧
	正宗嚴敬	落合和男		
農學院	奧田彥	三宅捷	松本巍	濱口榮次郎
	山根甚信	佐藤正一	白鳥勝義	安田貞雄
	馬場為二	一色周知	德岡松雄	加藤
	澁谷常紀	中村三八夫	高畑倉彥	大島康義
醫學院	添川正夫			
	森於菟	上林親一郎	小田俊郎	金關丈夫
	森下薰	河石九二夫	細谷雄二	酒井潔
	茂木宣	澤田平十郎	桂重鴻	真柄正直
工學院	薄田七郎	大橋平治郎		
	長岡順吉	河東準	熊澤尚文	譽田敏雄
	黑澤俊一	加藤二郎	安藤一雄	當山道三
	樋浦大三	山下正太郎	米屋秀三	芝龜吉
先修班	庄司彥六	鯨守新一郎		
	加藤平左衛門	森政勝	松村一雄	池田義一郎
	高田德太郎	立石新吉	都留正雄	宇都宮清吉
	溝邊龍雄	須藤襄	今澤正雄	佐藤文一
	久保田肇	岩崎英勇	富岡健次郎	東日出男
	大濱皓	手島逸郎	甲東謙	遠田一男
熱帶醫學研究所	吉田榮松	河上邦治		
	柳金太郎	宮原初男	岸田秋彥	登倉登
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	小林謙岡	塚本糾末		
	後藤一雄	大野一月		

由上述名單可見，除大學先修班之外，以農學院留用之日籍師資最多，其次分別為醫學院、工學院，再次為理學院、熱帶醫學研究所、文學院、南方人文研究所、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等，亦即大學當局係以留用自然科學師資為主，人文學科師資則因「中國化」政策之推行而儘量少留。然而，上述名單僅係初步擬訂，與其後獲得留用者略有出入。如文學院自接收之後，即在校務委員林茂生的主持下進行整編工作，在調整師資方面，至 1946 年 6 月底止，計留用東洋哲學教授後藤俊瑞、西洋哲學教授淡野安太郎、



民族學研究室副教授宮本延人、英文學教授矢野禾積、南洋史學教授岩生成一、桑田六郎、副教授小葉田淳、助教長岡新治郎等，<sup>35</sup>即與上述名單不相符，其他各院系亦有類似情形，<sup>36</sup>顯示當時師資窘迫之情況遠超出大學當局之預期，由是不得不多留用部分日籍師資。

對於臺灣大學留用日籍師資，在校內、外均引起相當的質疑和不滿。蓋臺灣原為日本殖民地，臺人向受日人侵凌，原以為戰後可將日人一舉逐出臺灣，不料政府卻有留用日人之舉，由是大不以為然，臺灣大學教職員生更是自學校接收之後，前去向代理校長羅宗洛陳述意見者「日有其人」。當時臺籍師生反日情緒以醫學院最烈，主張將日人勢力一掃而空，日人及日籍師資均應遣送回國，羅校長則以是時正當接收過渡時期，在臺籍學者人才稀少、中國大陸優秀學者不易羅致的情況下，為使事務不至停頓起見，酌留日籍人員實乃不可避免之事，況且學術無國界，飽學之士乃世界之寶，應不分國籍，盡量利用才是，如此始獲得諒解。<sup>37</sup>同樣的，省參議員們對於臺灣大學留用日人亦頗有微詞。1946年5月，省參議員黃純青即要求臺灣大學對臺灣過去的歷史和文學等要有新意的研究，以發揮臺灣大學的特色；同時要求臺灣大學應擔負貢獻祖國及世界學術之使命，多多採取世界文化，聘請歐美教授，並將中華民族發揚光大，聘請國內第一流教授來臺講學、多採用臺籍人士出任教授等，校長羅宗洛表示深有同感；而參議員蘇維梁則以工學院為何聘用日人提問，羅校長則表示工學院教授最難聘，國內這種人才很少，一方面待遇過低，無人願意來所致，實係不得已之事。<sup>38</sup>

<sup>35</sup> 〈教員工作調查表〉，《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32。〈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46。

<sup>36</sup> 〈理學院植物學系二年來工作簡報〉，《臺大校刊》，第6期（民國36年12月16日），版6。

<sup>37</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羅宗洛：〈國立臺北大學之展望〉，《臺灣新生報》，民國34年11月21日。黃得時：〈從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況〉，《臺灣文獻》，26卷4期、27卷1期合刊（民國67年3月），頁237。

<sup>38</sup> 臺灣省參議會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特輯》（臺北：編者，民國35年5月），頁85-87。〈發揮臺灣大學特色，宜研究本省精神文化〉，《臺灣新

輿論界對於接收後臺灣大學的師資任用，亦提出若干具體建言。其中，《臺灣新生報》於 1945 年底登載讀者「一知」之〈臺灣的大學教育〉一文，以「大學之臺柱之一是教授，大學的好壞，除設備外，多由於教授的好壞。臺北大學現在所有的教授聽說除有一位是臺灣人外，其餘都是日本人。在接收的初期，留用原有人員，由於實際的需要，這在各機關多是如此。大學自然不能獨立例外。原來學術是不應強分國界的。任何國家的大學，聘用外國教員，並不是罕見的事。不過，除了殖民地的大學以外，總是本國教授多而外國教授少。對於臺灣大學我們希望逐漸做到這一點。」<sup>39</sup>期待師資之專業化及來源的多元化。另外，《民報》社論〈學術與國界〉一文，則以儘管學術本來沒有國界，但是「學者卻是有國界的」，指出日本在臺設立臺北帝國大學實別有居心，所以「對於日本學者的努力，應該加以嚴重監視。」<sup>40</sup>

事實上，戰後初期臺灣大學之師資部署，除反映在學校主事者校長的態度之外，在「中國化」、「去日本化」政策主導下，人文學科之教學和研究方向逐漸產生質變，轉為以中國史研究為中心。<sup>41</sup>首任校長羅宗洛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的首次全校性集會中，即表示臺灣大學為國立大學，故應中國化，改制後之文、法學院，亦應為研究祖國文化之中心，不但要開發臺灣之產業，更應為中國研究學術之中心。因此，文、法學院師資以招聘中國大陸優秀學者來臺講學為宜，日籍師資除一、二特殊者外，以不聘用為原則。<sup>42</sup>對獲得留用者，羅校長均本著誠懇而寬大的態度相待，而日籍教授則因獲留用而充滿感激，其中松本巍教授更為補償日本軍閥對中國侵

---

生報》，民國 35 年 5 月 12 日。

<sup>39</sup> 一知：〈臺灣的大學教育〉，《臺灣新生報》，民國 34 年 11 月 18 日。

<sup>40</sup> 〈學術與國界〉，《民報》，民國 34 年 11 月 26 日，社論。

<sup>41</sup> 〈臺灣研究研討會紀錄〉，《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 4 種（民國 56 年 1 月）。

<sup>42</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羅宗洛：〈國立臺北大學之展望〉，《臺灣新生報》，民國 34 年 11 月 21 日。

略的罪戾而立下「埋骨在臺灣」的心願。<sup>43</sup>顯示雙方頗能展現學術不分畛域、超乎民族國界的作為。

對於日籍教授之留用暨甄審標準，不外乎教學需要及思想人品等項，大學當局除聽取臺籍教職員生對其教學、研究才能及人品高下之評價外，並派員赴各研究室與之談話，視察其實際工作狀況，以決定其去留。另一方面，由於校內各研究室均係日籍教授手創，一旦移交不無留戀之情，而且日本國內形勢混亂，求適當職位尚且不易，更何況是研究工作，因此獲准留用之日籍教授大多願意留任。<sup>44</sup>然而，由於日籍教授之留用期間未定，大學當局除根據「各機關徵用日籍人員人事管理暫行辦法」填發徵用通知書，並按照「本省各機關留用日籍人員生活費支給標準表」於臨時費項下支給生活津貼與米代金外，<sup>45</sup>對於各該教授之發聘，則因其不適用「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之規定，<sup>46</sup>教育部又遲遲未訂定日籍人員資格審查標準，致使大多數留用日籍教授無法取得正式聘書，大學當局亦以留用日籍教職員之遣送日期無法預知為由暫緩辦理其送審事宜，不再發給日籍教職員聘書，僅於留用期間照發薪津，但學術研究補助費需按聘定等級低一級支給，<sup>47</sup>不但身分地位曖昧不明，在升遷和福利上亦連帶

<sup>43</sup> 錢思亮：〈懷念松本巍教授〉、陳其昌：〈「決意埋骨在臺灣」〉、蒯通林：〈追念松本巍先生〉，《松本巍》（臺北：精華印書館，1975年），頁210-211、219-222、271-277。

<sup>44</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

<sup>45</sup> 〈華南人文研究所：發令通知簿、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39。〈華南人文研究所：薪俸生活津貼書類、所得稅關係書類、米貼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42。〈留用日籍職員薪津支給卷〉，《臺灣省臺中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19/073。

<sup>46</sup> 教育部參事室編：《教育法令》（上海：中華書局，民國36年7月，再版），頁156-157。教育部編：《教育法令》（臺北：正中書局，民國51年1月，臺四版），頁121。

<sup>47</sup> 〈華南人文研究所：發令通知簿、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39。〈文學院學術研究補助費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43。〈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47。〈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48。

受到影響，凡此均令留用日籍教授充滿不安定感。

第二任校長陸志鴻任內，除仍繼續留用部分日籍師資外，並積極延攬中國大陸學者來臺任教，尤以「知日系」學者居多，即以具有留學日本的教育背景，通曉日本語，且對於日本文化有某種程度的理解者為主，包括文學院長錢歌川、法學院長陳世鴻、工學院長魏品壽、農學院長王益滔、醫學院教務主任葉曙、農藝學系主任汪厥明、園藝學系主任譚克終、史學系主任涂序瑄等。<sup>48</sup>這些「知日系」學者儘管前此對臺灣之瞭解不多，但因其留學日本之因緣，與留用日籍教授往往是前後期之學長、學弟關係，具有相同的師承關係，例如羅宗洛和松本巍均畢業於日本北海道大學、馬廷英和早坂一郎均畢業於日本東北帝國大學，陳振鐸和大島康義均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等，<sup>49</sup>因此他們擔任臺灣大學教授後，在相關學術的延續和傳承上，實具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1946年10月陸校長就任之初，臺灣大學之教授約有200人，留用日籍教授87人，約及半數，而中國大陸來臺之師資則僅有40人，臺籍師資更少，<sup>50</sup>與1946年9月正式對外招生之私立延平學院，師資幾乎全以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之臺籍人士組成的狀況，形成強烈對比。<sup>51</sup>蓋戰後初期臺灣大學主持校務、院務及系務者，除林茂生短暫代理文學院長外，餘均為中國大陸籍學者，因其對臺籍精英之瞭解不多，所以在延攬師資時，乃以向來熟悉之中國大陸尋求為主，致使校內之中國大陸籍師資漸多，而臺籍師資則增加不多。相較之下，延平學院係由一群受過高等教育之臺籍

<sup>48</sup> 〈華南人文研究所：發令通知簿、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39。〈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47。黃英哲：〈許壽裳與臺灣（1946-48）〉，收入陳琰玉、胡慧玲編：《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1年），頁119。

<sup>49</sup> 曹永和總編輯：《臺北帝大的生活》（臺北：臺灣大學，1999年），頁56-57。

<sup>50</sup> 〈臺大昨日開學，陸校長談該校近況〉，《民報》，民國35年10月2日，版3。〈省參大會五日，聽取范教育處長報告教育工作〉，《民報》，民國35年12月17日。

<sup>51</sup>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頁84。

有志之士所創設之學校，自以延攬臺籍師資及培育臺籍人才為主，因此，除朱昭陽、朱華陽、宋進英、邱永漢等專任師資外，兼任師資亦大半來自於臺灣大學之臺籍師資，包括杜聰明、洪遜欣、林茂生、張漢裕、魏火曜、高天成、林宗義、陳茂源、曹欽源、陳成慶等。是故，儘管日治時期臺灣受過高等教育者為數不少，但就形式要件而言，欲擔任大學教職須具備一定的資格，尤其是曾在大學任教之經歷，<sup>52</sup>以致當時能擔任大學教職之臺人仍有所不足。

1947年1、2月間，臺灣大學留用之日籍教職員有99人，占全校專兼任教職員數之20%，其中，文學院37人、理學院24人、農學院17人、醫學院13人、法學院8人。至同年12月，全校教師450餘人中，日籍師資仍占8%，<sup>53</sup>師資窘迫的情況仍十分嚴重，甚至出現「代理的代理教授」及滿學校「廳處長」等人事上的怪現象，對於學校之教學、研究工作暨學生之學習等，均有其不良影響。<sup>54</sup>然而，二二八事件之後，輿論一致要求政府即刻遣返日籍教授，或將之派往工廠、公司充任技術人員或研究人員，並派員赴中國大陸各省延攬各大學教授來臺任教，以取代之，如此方為因應之道。<sup>55</sup>因此，1947年4、5月間，文學院小葉田淳、理學院河田末吉、小笠原和夫、農學院素木得一、醫學院森於菟、堀內次雄、小田俊郎、澤田平十郎等，即遣返回日本。事件後，仍得繼續留用之日籍教授，其活動

<sup>52</sup> 教育部參事室編：《教育法令》，頁156-157。依據教育部1940年10月4日公布之「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之規定，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除須取得相關學位外，並須具有曾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院所研究，或任前一等級三年以上資歷者始得擔任。

<sup>53</sup> 〈新聘教授四十餘名，多為國內知名學者〉，《臺大校刊》，第1期（民國36年10月1日），版3。〈徵用日籍員工有關案卷〉，《臺灣省臺中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19/066-5。河原功監修、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7卷，頁23-25、151-164。

<sup>54</sup> 〈代理的代理教授〉，《人民導報》，民國35年6月24日，版2。〈臺大易長〉，《公論報》，民國37年6月1日，社論。

<sup>55</sup> 姜琦：〈本省師範運動的重要性〉，《臺灣新生報》，民國36年4月4日。

範圍僅限於學院內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而已，與外界之接觸機會並不多。

1948年6月，臺灣大學再度易長，改由中央研究院院士莊長恭接任。莊校長為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在師資部署上，亦以「歐美系」學者居多，計有文學院長沈剛伯、史學系教授徐子明、李宗侗、哲學系教授方東美、陳康、工學院長彭九生、化學工程系主任陳華洲等。<sup>56</sup>然而，臺灣大學自戰後接收以來，短短的二年多時間即三易其長，頗令輿論界不以為然，以全臺最高學府的臺灣大學，內部人事制度不穩，當然辦學效率不彰，況且學校非官場，變動如此頻繁，實在值得注意。<sup>57</sup>連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中文系兼任教授魏建功亦抨擊臺灣教育無得力幹才，憤憤自用者多，「臺灣大學羅宗洛先被擺佈，陸志鴻復遭厭棄，而圖書館、南洋資料研究室全用日人，館長范壽康一任日人自理，卻未審察其究竟動靜，實有『養疽』之慨。」<sup>58</sup>對大學當局的留用日人甚為不滿，加上接收以來，因聘請教授未經制度化，且全賴校長人脈延攬師資，實有失之浮濫之虞，<sup>59</sup>於是莊校長乃決心整頓校內人事，對一部分舊有教員未予續聘或解聘，卻因無法應付一連串的人事風波而以辭職收場，在校時間僅六個月。

迨至1949年1月，傅斯年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延聘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毛子水、王叔岷、李濟、董作賓、屈萬里、凌純聲、芮逸夫等40人到臺灣大學任教，<sup>60</sup>師資陣容為之堅強，極一時之盛，師資結構與質量亦隨之出

<sup>56</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錄》（臺北：編者，民國40年1月）。

<sup>57</sup> 〈臺大易長〉，《公論報》，民國37年4月19日。

<sup>58</sup> 〈魏建功先生致傅先生函〉，《傅斯年檔案》，中研院史語所藏，檔號：II：120。

<sup>59</sup> 〈華南人文研究所：薪俸生活津貼書類、所得稅關係書類、米貼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42。根據「國立臺灣大學聘任教員規則」第一條之規定，本大學教員（包括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均由校長聘任之。

<sup>60</sup> 〈與傅校長論發展臺大〉，《公論報》，民國38年1月21日，社論。〈臺大四周年校慶前夕訪傅斯年校長〉，《臺灣新生報》，民國38年11月14日。〈國內碩彥咸集本校〉，《臺大校刊》，第25期（民國38年3月5日），版2。〈文學院人事函件〉，《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39-01。李東華：〈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孟真先生在臺大〉，《臺大歷史學報》，第20期（民國85年11月），頁132-133、142。

現根本性的改變，轉為以中國大陸學者居多，臺籍師資不及 5%，<sup>61</sup>而留用之日籍師資亦多於 1949 年底返回日本，<sup>62</sup>僅有極少數仍獲得留用，如松本巍、高坂知武、磯永吉等。其中，植物病蟲害學系教授松本巍於 1965 年 7 月方以 74 歲高齡自臺灣大學退休，返日未久，又於翌年 2 月應臺灣糖業公司之聘，擔任糖業試驗所的技術顧問，從事甘蔗白葉病的研究，並再度回到臺灣大學擔任兼任教授，指導研究生論文，未料因罹胃癌，於 1968 年 1 月 27 日辭世，為紀念其在教育和研究上之功勞，由其門生及農學界人士樂捐成立「松本故教授紀念獎學金」，作為專攻植物病理學的學生獎學金。<sup>63</sup>農業工程學系教授高坂知武向以臺灣的農具作為研究主題，且為授課之需要，自修國語，並發起成立管弦樂團、室內樂團等，與學生的互動頗為融洽，因此，一直留用至 83 歲，始退休返回日本。為表揚高坂教授的貢獻，農學院農業機械學系的建築物乃命名為「知武館」，並設置獎學金等；而 1957 年始返回日本的磯永吉，政府為酬謝他多年來對培育臺灣蓬萊米的非凡成績，決定送他終生每年 1,200 公斤的蓬萊白米。<sup>64</sup>

綜上所述，戰後初期各機關均根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訂定之留遣政策及其實際需要，留用若干日籍人員，臺灣大學自不例外，惟全臺最高學

<sup>61</sup> 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錄》。傅斯年：〈兩件有關臺灣大學的事〉，《臺灣新生報》，民國 38 年 7 月 19 日。

<sup>62</sup> 〈臺灣省殘餘日僑集中遣送實施辦法〉，《臺灣省政府公報》，37 年夏字第 16 期，頁 232-233。〈電為遣送日僑有關交通運輸及港口臨時集中地點等事項希遵照切實協助辦理〉，《臺灣省政府公報》，37 年夏字第 18 期，頁 268。〈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代電〉，《臺灣省臺中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19/066-5、6。〈殘留日僑集中遣送實施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49/095。〈殘餘日僑集中遣送辦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49/123。〈日僑管理〉，《臺灣省警察單位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74/1270-2。〈日僑規避回籍〉，《臺灣省警察單位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74/1262-2、14。

<sup>63</sup> 那廉君：〈記植物病理學家—松本巍教授〉、蘇鴻基：〈憶松本巍吾師〉，《松本巍》（臺北：精華印書館，1975 年），頁 223-225、235-239。

<sup>64</sup> 〈日僑管理案〉，《臺灣省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74/1267-1。河原功監修、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頁 12。

府之師資竟以日人為主，不但有礙「中國化」政策之推行，抑且影響臺人之提升，必然與社會上之普遍期待出現落差。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加速遣返日籍師資，而留用日籍師資亦因身分地位及待遇福利遲未明確規範，生活普遍缺乏安定感，並無長久留臺之想，是故，待相關之教學、研究工作接替有人後，日籍教授均希望返回日本，結束在臺生活，而臺灣大學的師資結構亦轉而為以中國大陸籍學者為主，臺籍僅係點綴而已。

## 肆、學術研究：以考古人類學為例

### 一、日治時期考古人類學研究及其成果

臺灣之人類學研究起源頗早，自 17 世紀的荷蘭時期，經鄭氏、清代的經營，均曾留下有關臺灣人類學資料。1895 年日本領臺後，曾先後派遣專家學者來臺，投入臺灣之「學術探險」和研究工作，其中，人類學方面之代表性人物有伊能嘉矩、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其有關臺灣原住民族之蒐藏和研究成果，實已奠定近代臺灣科學的人類學實證研究之基礎。<sup>65</sup>至於有計畫、有規模地調查臺灣原住民族，則始於 1909 年 4 月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成立蕃族科以後。該科專事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及各項生活習慣調查，於 1913 年至 1921 年間，先後發行《蕃族調查報告書》、《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臺灣番族慣習研究》、《臺灣蕃族志》，以及《臺灣蕃族圖譜》等書，<sup>66</sup>成果相當豐碩，不但是人類學研究之重要範

<sup>65</sup>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和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黃富三等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年），頁 26-28。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7 年），頁 2001-2005、2018-2019。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年 1 月），頁 601-638。

<sup>66</sup> 陳奇祿：〈「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和臺灣高山族研究〉，《臺灣土著文化研究》（臺北：聯經，民國 81 年），頁 478-489。鄭政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1896-1922)〉，



本，對於臺灣總督府有效推行理蕃政策之助益亦大。

1928年3月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臺灣之人類學研究正式進入學院研究階段而更加興盛。文政學部史學科學生除就國史學、東洋史學及南洋史學三者擇一專攻外，亦必修土俗學、人種學課程，由移川子之藏教授負責講授。<sup>67</sup>移川為日本福島二本松人，中學時赴美求學，其後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主修人類學，取得碩士學位後，進哈佛大學繼續專攻人類學，師事以研究太平洋民族學得名的Roland B. Dixon博士，並取得博士學位。返回日本後，先後執教於慶應大學、東京商科大學等校，1925年獲籌備中的臺北帝國大學延攬後，即於1926年親赴日本遠野市拜訪伊能嘉矩遺屬，情商伊能藏品之讓渡事宜，之後轉赴歐洲考察研究二年，並於1928年返臺主持土俗人種學講座，為臺北帝國大學創立時最早設立的講座之一。<sup>68</sup>

在移川教授領導下的土俗人種學講座，深受當時美國流行之歷史人類學影響，側重標本資料的蒐集，並以研究為主，教學為輔。雖然該講座僅有一位教授、一位助手，卻能擁有教授室、圖書室、標本整理室、照相暗室、實驗室及標本陳列室等設備，在豐沛的財力、物力支援下，陸續搜藏不少華南、南洋地區之民族學、考古學及體質人類學方面的標本，除伊能遺屬讓渡之相關藏品約300件外，尤以臺灣各原住民族具文化特色的標本最多，例如平埔族的織繡品、日月潭水社的獨木舟、阿美族的蒸壺、衣飾、泰雅族的織貝、獵頭及黥面用具、鄒族的鹿皮衣帽、布農族的籠紋陶器、排灣族的木彫、織繡、琉璃球、陶器，以及雅美族的小舟、魚皮甲、銀飾、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7月，頁125-127、150-167。

<sup>67</sup> 〈教員工作調查表〉，《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32。松本巍著，蒯通林譯：《臺北帝國大學沿革史》，頁6。

<sup>68</sup> 馬淵東一：〈移川先生の追憶〉，《馬淵東一著作集》，第3卷（東京：株式會社社會思想社，昭和49年9月），頁467-483。宮本延人著，魏桂邦譯：《臺灣的原住民族》（臺中：晨星出版社，民國81年）。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翻譯、編輯：《我的臺灣紀行》（臺北：南天，民國87年），頁24-27。宋文薰：〈移川子之藏與土俗人種學教室〉，《人類學玻璃版影像選輯》（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民國87年），序。

陶器、發火用具等，十七年間入藏的標本多達 3,435 種，無論在數量上或學術上，均具有重大意義。<sup>69</sup>

考古學方面的業績，始於 1930 年在墾丁發現石棺遺跡。1931、1932 年，移川、宮原敦、宮本延人等前後共進行三次挖掘作業，掘出石棺 25 具及大量陶器、石器、骨貝器與動物的骨骸等，堪稱是臺灣第一次真正的考古發掘作業，所取得的資料及其所顯示之意義均極具參考價值。其後，1934 年移川教授與宮本助手曾調查蘇澳區新城的石棺遺跡；1938 年淺井惠倫、宮本延人及金關丈夫等人曾發掘埔里烏牛欄大馬璘的石棺遺跡。1939 年 1 月，移川教授、宮本助手及國分直一等挖掘二層行溪南岸的大湖貝塚後，臺灣西部平原陸續有重要的史前遺址發現，包括臺南臺地稍北的蔦松貝塚、大湖貝塚西側的湖內貝塚、烏樹林、大肚丘陵西側之大肚、清水等遺跡、大肚溪北岸之營埔遺址，以及新竹縣竹南區之後龍底貝塚、中壢區海岸之草漯遺跡、臺北景尾對岸尖山西麓遺跡等，由是乃知西海岸的中部及南部均係黑陶盛行地區。之後，又在澎湖良文港、營埔、江頭、圓山等遺跡發現彩陶，由是確認臺灣史前時代與中國大陸北方文化的關係，成績相當豐碩。<sup>70</sup>

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在漫天戰火中，臺灣的考古挖掘與調查工作並未因此中斷。1944 年 12 月 31 日，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等前往以巨石文化遺跡知名的臺東卑南社附近進行挖掘，在淺豎穴式住宅內發現不少石杵、黑陶土環、良質的鼎器陶器、石鏟刀及石菜刀等，另又發現粗面的赤褐色土

<sup>69</sup> 文政學部史學科編：《臺北帝國大學開學式紀念展覽目錄》（臺北：編者，昭和 11 年 5 月），頁 58-71。芮逸夫：〈本系標本搜藏簡史〉，《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1 期（民國 42 年 5 月），頁 16-19。翁佳音：〈臺北帝大的平埔族研究〉、張隆志：〈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與臺灣原住民史研究〉，《臺北帝國大學史研究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民國 79 年 7 月）。許進發：〈移川子之藏與臺灣人類學的奠基〉，《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學術討論會》，頁 6-9。

<sup>70</sup>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臺灣文化》，6 卷 1 期（民國 39 年 1 月 25 日），頁 9-15。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臺灣考古誌》，頁 41-45。

器、打製粗造石器、鍬形石器、石鐮刀、石菜刀等，由是確定該地區曾有過石造房屋的村落，且居民以從事農耕為主的生產。在文化的關連上，卑南石造屋常以較平坦的地面做為建地，建地的平面呈現長方形，屋頂使用茅草，以及陶器、石器等，均與阿美族系雷同，與大武地區的排灣族之石造住屋、箱式石棺雖有近緣性，但箱式石棺並非伸展葬的長方形，而是屈膝墓葬的方形，顯見兩者應分屬不同文化相。凡此均為過去未曾出土的新資料，在當時受到相當的矚目。<sup>71</sup>

除了標本的收藏及考古的發掘之外，土俗人種學講座最大的學術業績，厥為 1935 年出版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一書，並獲得 1936 年度日本帝國學士院獎。該書係利用卸任總督上山滿之進捐贈之基金，以研究臺灣原住民為條件而展開者，除土俗人種學講座外，亦贊助語言學教授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從事臺灣原住民語言與傳說之研究，並完成《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一書，獲得 1936 年度日本帝國恩賜獎。前者係在移川教授、助手宮本延人及史學科畢業生馬淵東一等人的共同參與下，自 1930 年起至 1932 年間，根據中、荷文獻、口語傳說等資料，陸續採集全島各地原住民各社的系譜，調查各部族的構成、社會型態及其移動情形等，並製作地圖、一覽表及照片等，頗為豐富詳實。經過調查結果，將臺灣的原住民族群由臺灣總督府所劃分的泰雅、賽夏、布農、鄒、排灣、阿美、雅美七族，修正為泰雅、布農、賽夏、鄒、排灣、魯凱、卑南、阿美、雅美等九族，並就各族之系統、語言、習俗等進行調查研究，為早期研究原住民族群分類極為重要的著作。<sup>72</sup>

同時，移川教授又於講座營運逐漸步上軌道之際，即 1931 年主導成立

<sup>71</sup>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臺灣東海岸卑南遺跡挖掘報告〉，《臺灣考古誌》，頁 130-157。

<sup>72</sup>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編：《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東京：株式會社凱風社，1988 年 12 月復刻）。〈小川、移川兩教授の受賞〉，《南方土俗》，4 卷 2 號（昭和 11 年 8 月），頁 45-47。馬淵東一：〈高砂族に關する社會人類學〉，《馬淵東一著作集》，第 1 卷，頁 466-483。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翻譯、編輯：《我的臺灣紀行》，頁 85-167。

南方土俗學會，並創辦《南方土俗》（1940年改為《南方民族》）雜誌，結合當時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小川尚義、淺井惠倫、桑田六郎、力丸慈圓，以及理農學部教授山根岸信、早坂一郎、醫學部教授金關丈夫、森於菟，甚至是總督府的囑託等對民族學、考古學有興趣之學者、專家，進行相關學術的交流與傳播活動，是當時史學科中頗為活躍的學會。<sup>73</sup>1936年6月，為彌補向來臺灣史資料不充分、史蹟日趨煙滅等問題，臺北帝國大學乃於史學科內成立「臺灣史料調查室」，結合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南洋史學及土俗人種學各講座，進行臺灣史蹟、史料的蒐集與整理工作。其中，土俗人種學講座亦將其田野調查重心和研究觸角擴及臺灣的全體民族，並配合總督府之「皇民化」運動，進行臺灣寺廟信仰問題的調查，助手宮本延人還因此被任命為總督府宗教調查官，除廣泛蒐集各寺廟之碑記、拓本外，並據此糾正前人論著之繆誤處。然而翌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因經費遭刪除而停止，前後共進行23次史蹟調查工作。<sup>74</sup>

除了土俗人種學、言語學教室外，醫學部解剖學教授金關丈夫亦是當時體質人類學、考古學方面的著名學者，其由高砂族和平埔族之人類學計測，闡明臺灣原住民族在人類學上之地位，進而主導成立臺北人類學談話會，並於1941年與岡田謙、陳紹馨、黃得時、須藤利一等人共同創辦《民俗臺灣》，結合學院內、外人士進行臺灣、華南及南洋風俗、習慣之研究與

<sup>73</sup> 南方土俗學會編：《南方土俗》（臺北：東方文化書局，民國61年復刊）。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南方土俗』景印本刊行に寄せて〉，《馬淵東一著作集》，第3卷，頁549-553。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頁94-97。

<sup>74</sup> 〈臺灣史料調查室の設置〉，《南方土俗》，4卷2號，頁51-52。松本盛長：〈臺灣史料調查室報告第一〉，《南方土俗》，4卷2號，頁52-57。〈臺灣史料調查室報告第二〉，《南方土俗》，4卷3號（昭和12年5月），頁51-55。〈臺灣史料調查室報告第三〉，《南方土俗》，4卷4號（昭和13年6月），頁32-34。方豪：〈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立臺灣大學三十週年校慶專刊》（臺北：臺灣大學，民國65年3月），頁3-4。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翻譯、編輯：《我的臺灣紀行》，頁184-190。

介紹，至 1945 年 1 月 5 卷 1 號廢刊為止，共發行 43 期，頗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迴響。<sup>75</sup>其他如農學部農業經濟學講座教授奧田彧之原住民土地制度、農業調查；助教授增田福太郎之原住民宗教、婚姻研究；社會學講師岡田謙之原住民社會組織、慣習法用語及祭儀生活調查等，<sup>76</sup>對臺灣原住民調查和研究均獲致豐碩的成果，為戰後臺灣的人類學研究奠定基礎。

## 二、臺灣大學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

1945 年 5 月，臺北遭受大轟炸，土俗人種學講座所屬之標本室、玻璃、櫥櫃及室內一切設備均遭到嚴重破壞，標本被埋入牆土、瓦礫及玻璃碎片中。當時駐守臺北的日軍，因營房被毀，占居校內，已經遭受損害的標本室乃成為士兵的臨時營房，致使標本室陷入荒廢狀態中。8 月 15 日，日本戰敗投降。11 月 15 日，臺北帝國大學接收完畢後，原土俗人種學講座改為民族學研究室，隸於文學院史學系，由陳紹馨教授主其事，並留用日籍副教授宮本延人管理標本室，仍繼續蒐集有關華南、南洋人文之標本，又得日籍學者、收藏家將其搜藏標本贈予或售予標本室，因此，在短短的三年半間，入藏的標本又增加 254 種。然而，由於戰後初期社會失序和經濟破敗，標本室中遭戰爭破壞之天花板、陳列櫃等不但未能修理，若干美術品、生活用具、宗教法物、武器等亦被竊，許多史前時代的標本已經散失，損失不可謂不大。後經宮本延人和國分直一兩人共同收拾與整理標本，陳紹馨教授設法修理標本室及陳列櫃，標本室才逐漸恢復舊觀，標本的恢復約達六成。<sup>77</sup>

<sup>75</sup> 翁佳音：〈日治時代平埔族的調查研究史〉，《臺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臺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民國 77 年 6 月），頁 60-61。張美惠：〈金關丈夫氏と『民俗臺灣』と臺北帝大と〉，《日本歷史》，第 595 號（1997 年 12 月），頁 60-64。黃稱奇：《撐旗的時代》（臺北：悅聖出版社，民國 90 年 10 月），頁 213-215。

<sup>76</sup> 馬淵東一：〈高砂族に關する社會人類學〉，《馬淵東一著作集》，第 1 卷，頁 474-478。

<sup>77</sup> 陳紹馨：〈文學院民族學標本陳列室概況〉，《臺大校刊》，第 4 期（民國 36 年 11

戰後初期臺灣大學史學系設有中國史學、西洋史學、南洋史學、日本史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六個研究室，主持人分別為郭廷以、涂序瑄、楊雲萍、陳紹馨等，研究員有夏德儀、吳侗、周召南、國分直一、桑田六郎、宮本延人等，<sup>78</sup>留用日籍教授尤為延續臺灣考古人類學研究之主力。其中，金關丈夫和國分直一兩人自 1946 年初以迄於 1949 年 8 月遣送返日的三年間，曾多次率領史學系學生何廷瑞、張耀錡、宋文薰、劉斌雄等從事考古工作，包括臺中縣埔心子石棺遺跡的發掘、臺中縣大肚溪北岸營埔遺跡的發掘及其附近的調查、新竹縣後龍底及苑裡貝塚的發掘、基隆市社寮島石棺的發掘、曾文溪上游地區的調查、小琉球島的調查與發掘、臺南臺地新遺物包含層的發現、新竹縣海岸地區及大料炭溪沿岸的調查、臺北市植物園附近貝塚的發現、臺北市北郊尖山遺跡的調查、樹林遺跡、芝山巖遺跡、六張黎遺跡、社仔遺跡、江頭遺跡的調查，並推測臺灣北部海邊的考古遺跡與凱達格蘭、噶瑪蘭有關等，<sup>79</sup>均係戰前相關考古工作之延伸調查與研究，對於臺灣史前遺跡相互間的關係，及其與南島系原住民族文化之關係得到更進一步的瞭解。

以 1946 年 11 月在新竹縣後龍底及苑裡貝塚的發掘為例，此次發掘係由臺灣省編譯館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編審國分直一，會同臺灣大學教授金關丈夫等，共同赴新竹縣苑裡及後龍底兩處發掘史前遺物，成績頗為豐碩。除攜回石器、陶片、陶器、獸骨等 4,500 餘件外，並發現兩貝塚間無論是自然遺物或文化遺物皆有其相似處，由是證實國分、金關有關臺灣史前時代存有若干中心聚落及由此中心聚落分出殖民聚落的現象。

---

月 15 日），版 9。芮逸夫：〈本系標本搜藏簡史〉，《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1 期，頁 18-20。〈文學院研究設備費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42。

<sup>78</sup> 〈史學系研究室主持人已配妥〉、〈史學系各研究室一覽表〉，《臺大校刊》，第 9 期（民國 37 年 2 月 1 日），版 2、4。

<sup>79</sup>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臺灣先史考古學における近年の工作〉，《臺灣考古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 年 10 月），頁 24-48。杜聰明：《回憶錄》（臺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民國 71 年 8 月，再版），頁 112。

由此次兩貝塚之發掘，更可推定苑裡曾是史前時代臺灣中北部之重要中心聚落，曾長時期保持黑陶文化之傳統，並發揚光大。同時，就掘獲之資料觀之，後龍底遺址當為苑裡中心聚落之殖民聚落，而苑裡史前聚落又與中部大肚丘陵及大肚溪沿岸之清水、營埔等史前聚落之文化互為關連，而且苑裡史前遺址擁有較為豐富的貝塚，經發掘貝塚的長厚部分，可以明瞭史前時代金石並用的情況，並於包含黑陶及押型紋陶器之貝層中發現彩色陶器，由此可見臺灣史前時期曾攙入中國遠古文化之傳統，並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可推知臺灣本島與中國大陸的歷史關係，使臺灣的歷史為之改觀，意義實甚重大。<sup>80</sup>

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6月，臺灣產官學界組成「蘭島科學調查團」，以臺灣大學地質系主任兼臺灣省立海洋研究所長馬廷英為團長，與臺灣大學醫學院教授金關丈夫、農學院教授山本由松、理學院德籍教授 G. H. S. Schwafe、文學院副教授兼臺灣省編譯館編審國分直一、海洋研究所川口一郎、金子壽衛男、攝影師松山虔三等人，前往蘭嶼進行田野調查，以觀察政府接管後雅美族人之生活習慣、生產技術及葬祭習俗等方面的改變。在十一天的調查行動中，雖有遭雅美人追逐的恐怖情境，山本由松教授甚至被恙蟲所咬，罹疾致死，但金關、國分等人在椰油社海邊發現以往所未見之岩頭曝葬（Platform-exposure），與其他社在森林中的岩石埋葬的方式不同，此一發現顯示與菲律賓經蘭嶼及琉球列島之海岸岩場曝葬或洞窟曝葬（cave burial）有關聯。這些埋葬樣式之存在，顯示該島原住民族之構成問題並不單純，實為此次調查最重要的收穫。另外，尚有金子壽採集之石環、金關採集之星座、國分採集之「二個太陽」的傳說等收穫。此次調查行動，在調查型態、內容及方式上均可視為戰前相關調查研究的延續。<sup>81</sup>

<sup>80</sup> 〈發掘先史遺物，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民報》，民國35年12月6日，版3。

<sup>81</sup> 國分直一：〈戰後臺灣における史學民族學界：主として中國内地系學者の動きについて〉、〈終戦後の紅頭嶼（蘭島）調査〉，《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株式會社開明堂，昭和56年2月），頁3-5、336-355。〈日籍教授山本罹疾逝世〉，《臺大校刊》，第1期（民國36年10月1日），版3。〈日籍教授山本由松當局將發給撫卹

在官方修史方面，留用日籍教授亦以其專業知識扮演協力者的角色。1946年8月7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臺灣省編譯館，由畢業於日本東京高師、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的許壽裳出任館長。最初分為學校教材、社會讀物、名著編譯及臺灣研究等四組，以編譯、審查臺省教育圖書及學術文化書籍，並分擔部分的文化任務。<sup>82</sup>其中，臺灣研究組主任由編纂楊雲萍兼任，計劃編纂臺灣文獻目錄、翻印善本書、蒐集並刊印日本專家之名作、校刊有關臺灣的稀有重要文獻等。<sup>83</sup>之後，楊雲萍推薦昆蟲學家素木得一、言語學家淺井惠倫、史前史學權威國分直一、民俗研究家池田敏雄、畫家立石鐵臣留任臺灣研究組，使其有繼續日治時期未完成研究的機會。<sup>84</sup>至1947年1月為止，臺灣史編撰組已完成者，有楊雲萍編《臺灣書誌考》、岩生成一、鄭桓編《明末旅日華僑甲必丹李旦與鄭芝龍》、國分直一編《後龍底及苑裡先史遺跡發掘預報》等書。<sup>85</sup>惟臺灣省編譯館雖係在各方的期許下成立，然成立不過十個月，即於1947年5月16日遭到撤廢，<sup>86</sup>未能完成預期工作。臺灣史編撰組成員中，除楊雲萍獲聘為臺灣大學史學系教授外，僅國分直一進入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餘均返回日本。

另外，創刊於1947年10月25日之《公論報》，社長李萬居為使初返

---

金》，《公論報》，民國36年12月19日，版3。國分直一：〈關於紅頭嶼的埋葬樣式〉，《臺灣文化》，5卷1期（民國39年7月1日），頁45-54。

<sup>82</sup> 〈本省編譯館，現正積極展開工作〉，《民報》，民國35年11月27日，版3。〈臺灣省編譯館舉行教科書問題座談會〉，《民報》，民國35年12月12日，版3。黃英哲：〈臺灣省編譯館研究（1946.8-1947.5）：陳儀政府臺灣文化重編機構研究之一〉，收入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惠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8年），頁98。

<sup>83</sup> 方豪：〈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頁5。

<sup>84</sup> 林春蘭編：《楊雲萍教授年表》（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9年10月），頁17-18。國分直一：〈戰後臺灣における史學民族學界：主として中國内地系學者の動きについて〉，《臺灣考古民族誌》，頁3-4。

<sup>85</sup> 〈編譯館招待記者，報告半年間之工作〉，《民報》，民國36年1月22日，版3。

<sup>86</sup>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編：《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臺中：編者，民國74年4月），頁17。



祖國懷抱的臺人瞭解祖先來臺開拓過程，特自翌年 5 月 10 日創辦「臺灣風土」副刊，專門介紹臺灣史地風俗，至 1955 年 5 月 3 日終刊為止，共出刊 195 期。每期所占篇幅約為報紙的半頁，字數約 8,000 字。主要撰稿人有陳奇祿、楊雲萍、陳紹馨、戴炎輝、金關丈夫、宮本延人、國分直一、立石鐵臣等人，以臺灣大學關係人士居多。其中，楊雲萍以撰述關於臺灣書誌或歷史人物的文章為主；陳紹馨除民俗外，兼及民族學的研究；戴炎輝則以撰寫關於法制與民事習慣的文章；而留用之日籍講師立石鐵臣為一畫家，曾撰寫數篇附有插圖的文章，如〈七爺八爺〉、〈臺灣最古的基督教建築〉等，頗富趣味性；金關丈夫曾寫兩篇關於傳說的短稿；宮本延人則撰寫民俗學的文章；至於國分直一更是熱心，除撰寫有關考古學的專文外，並與立石先生合作，開闢「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專欄，企圖將臺灣史前時代之調查研究成果圖像化，由立石先生繪製插圖，國分先生撰寫解說，介紹臺灣史前時代原住民族之物質文化等，<sup>87</sup>對於臺灣史研究的大眾化和普及化，實有相當大的貢獻。

1948 年 10 月 25 日，臺灣省為慶祝臺灣光復，假總統府介壽堂舉辦大型博覽會。博覽會設有風土館和文獻館，其中，風土館第一室即由臺灣大學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辦理，由陳紹馨教授規劃介紹臺灣原住民族文化，陳列品分為：其一、總括的說明；其二、史前時代；其三、現代的情形：物質生活、社會生活及精神生活等三大項。至於文獻館則展示臺灣文物，由楊雲萍負責，介紹臺灣南島語系原住民文化的「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亦在展出之列。兩館所展示者均係留用日籍教授多年來之研究成果，普遍受到各界好評。<sup>88</sup>迄至是年年底，由於日籍教授宮本延人、講師立石鐵臣

<sup>87</sup> 陳奇祿：〈我和臺灣研究〉，《臺灣土著文化研究》（臺北：聯經，民國 81 年），頁 491-495。國分直一：〈「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成立の記〉、〈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臺灣考古民族誌》，頁 380-478。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解說〉，《臺灣考古誌》，頁 305-312。

<sup>88</sup> 陳紹馨：〈臺灣山地同胞生活情形之民族學的展觀〉，《公論報》，「臺灣風土」，第 24 期，民國 37 年 10 月。芮逸夫：〈本系標本搜藏簡史〉，《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

等人即將被遣送返日，其在臺灣大學經管之儀器、圖書及各項公物等，乃由陳紹馨教授接管。

1949年7月20至31日，臺灣大學教授陳紹馨、助教陳奇祿、學生何廷瑞、劉斌雄、宋文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芮逸夫、董作賓、石璋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協纂林衡立、臺灣山地建設協會理事林瑞昌，以及中途加入之埔里初級中學教師劉枝萬、省立師範學院學生陳金河等人，組成林氏學田山地調查團，前往臺中縣中峰區仁愛鄉力行村泰雅族的發源地瑞岩，進行田野調查。在十二天的調查活動中，由李濟負責泰雅族人的體質人類學計測，芮逸夫負責系譜，董作賓負責時間觀念，陳紹馨負責人口、教育及家族的構成分子，石璋如和陳奇祿負責衣、食、住，林衡立負責宗教，何、宋兩生則擔任通譯。另外，一行人又赴大馬璘、營埔等遺址探勘，發現不少陶器、石器，均值得進一步發掘。上述調查報告，於1950年2月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集結出版《山地文化特輯—瑞岩民族學調查報告》一書。<sup>89</sup>這一次短期集體田野調查工作，除了進一步釐清臺灣史前人類和文化所屬的系統及其來源外，也是中國大陸學者來臺後首次和臺籍師生合作進行之臺灣考古學、人類學研究，頗具承先啟後、世代交替之歷史意義。8月，國分直一和金關丈夫教授即解除留用返回日本，結束在臺之考古學、民族學研究工作。<sup>90</sup>

未久，臺灣大學即以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為基礎，成立考古人類學系，

---

類學刊》，第1期，頁19。陳奇祿：〈光復後初期的臺灣研究〉，《慶祝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建館七十八週年暨改隸中央二十週年紀念館藏與臺灣史研究論文發表研討會彙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民國83年），頁431-432。

<sup>89</sup> 陳紹馨：〈調查經過〉，《山地文化特輯—瑞岩民族學初步調查報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39年2月）。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記錄：《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91年4月），頁335-338。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頁109-112。

<sup>90</sup> 國分直一：〈戰後臺灣における史學民族學界：主として中國内地系學者の動きについて〉，《臺灣考古民族誌》，頁13-14。陳奇祿：〈我和人類學系〉，《從帝大到臺大》（臺北：臺灣大學，2002年11月），頁39-40。

李濟博士以身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和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身分，與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文學院長沈剛伯共同創辦考古人類學系，並延攬董作賓、芮逸夫、石璋如、衛惠林、凌純聲等人為師資，<sup>91</sup>使得因為日籍教授返國而瀕臨中斷的臺灣考古學界，不但重新獲得生機，且能不斷地成長。至於原史學系教授陳紹馨亦於同年 8 月 29 日改聘為考古人類學系教授，講授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課程。9 月 13 日，陳奇祿因負責歷史文物標本室之管理，亦改聘為考古人類學系助教。<sup>92</sup>臺灣的考古學、人類學研究隨之進入另一個嶄新的階段。

臺灣之考古人類學研究歷經長時間的推演和累積，於各個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風貌和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自 1945 年 11 月臺北帝國大學改制為臺灣大學，以至於 1949 年 8 月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成立的四年之間，臺灣的考古學、人類學研究幾乎仰賴留用日籍教授勉強維持現狀，研究成果亦以是類教授居多，不但延續學院內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並由學院內延伸至學院外之官方修史及相關學術的普及，其服務精神和專業能力普遍受到大學當局和各界之肯定，不但為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相關研究工作得以賡續之主力，且為往後相關學術的開發和研究奠定基礎，重要性不言而喻。

## 伍、留用日人之處境

戰後初期，臺灣由日本殖民地轉而成為中華民國領土，原居留在臺灣的日本人，對於自身之去留頗感到猶疑不定。蓋戰後初期在臺日人已由原來的統治者轉而成為敗戰者，不但處境相當尷尬而難堪，對其身分、地位之保障，更是深感不安和無奈，部分在臺日人因留臺時日長久，早已視臺灣為第二故鄉，甚至是「埋骨」之地；反觀是時日本國內在經過多年戰爭

<sup>91</sup> 陳奇祿：〈中國民族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臺灣土著文化研究》，頁 465-467。

<sup>92</sup> 〈文學院通知函件〉，《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45。

的洗禮及美軍的猛烈轟炸後，早已是滿目瘡痍，糧食、物資極端缺乏，就業、生活艱難，社會秩序不穩。相較之下，留在臺灣似乎較遣返回日本安定得多，因此，從戰爭結束之初到 10 月中旬，有超過半數的在臺日人不願返國，願意繼續留臺，規避遣返之日人亦大有人在，可見其時在臺日人之處境。<sup>93</sup>

1945 年 8 月戰爭結束之後，各級各類學校學生紛紛於 9 月底返回校園，臺灣大學之臺、日籍學生亦先後返校繼續學業，然而，是時學校尚未步上軌道，處於短暫的真空狀態，不但學制、課程未定，學校亦未真正開課，況且由於師資嚴重缺乏，甚多課程無人講授，尤以社會科學方面的課程最為嚴重。為免學生荒廢課業，不得不因人設課或一人負擔二人的工作等，平均一天只上一、兩堂課，還是日籍教授來上的。惟部分臺籍生基於意氣不願再受日人之教育，更不願與日生同堂聽課，由是乃以學習國語為由未到校上課，因此，最初僅有日籍生照常上課。11 月 15 日，臺北帝國大學接收完畢後，日籍教授雖得暫時留用授課，但是日籍學生卻因臺籍學生的嚴重排擠而自動不到校上課，並陸續申請轉往日本國內求學，看在日籍教授眼裡，真是感慨萬千。<sup>94</sup>慶幸的是，最初雖曾發生反對留用日人之事，惟留用日籍師資與臺籍、中國大陸籍師資間之相處尚稱融洽。此與三者均以留日背景者居多，且部分為前後期學長、學弟關係有關，彼此在學問上相互欽敬，生活上亦未有對立或衝突。

<sup>93</sup> 日本大藏省管理局編：《日本の海外活動に関する歴史的調査》，通卷第 17 冊臺灣篇第 6 分冊の 2，餘錄〈日僑の追憶〉，頁 1-2。塩見俊二：《秘録・終戦直後の臺灣—私の終戦日記》（高知：高知新聞社，昭和 55 年 3 月），頁 49-50。〈日俘重返故國，心境倍覺淒其〉，《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1 月 11 日，版 3。〈臨別贈言：送別歸國日僑〉，《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3 月 24 日，版 2。〈遣返日僑秩序良好，日人心中不勝悵惘〉，《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3 月 29 日，版 3。

<sup>94</sup> 〈南方人文研究所：證明書控綴〉，《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244。〈文政學院歸還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27。〈為本省學生呼籲〉，《公論報》，民國 37 年 3 月 9 日。黃稱奇：《撐旗的時代》，頁 161-172。

當然，語言在戰後初期臺灣校園中亦是教學上所必須面對的問題之一。最初兩年間，由於臺灣大學學生以臺籍居多，教師亦以留用日籍為主，各學院教授多以日文授課，大學當局亦同意留用日籍教授以日語講授。醫學院教授除了日文之外，術科幾乎用德文講授，學生亦能接受，並無語言問題；迨中國大陸籍學生日增後，始漸改為以國語教學。<sup>95</sup>至於教授的上課方式，一般均以口頭講授為主，間或播放幻燈片，邊放邊講，或自編補充教材，輔助課程的進行，其中亦不乏研究有成者，隨時以最新的研究成果教導學生，頗受到學生的肯定和支持。<sup>96</sup>

然而，自 1945 年底以降，情況卻發生重大變化，希望返國者漸次增加，其原因在於臺人對日人之態度轉為露骨的壓迫，報紙亦不斷鼓吹反日情緒，而留用日人問題具體化之後產生大量的失業者、物價日益上漲、日人生活普遍陷入貧困等，在在均令日人感到不安，臺灣大學的留用日籍教授亦不例外，在食、衣、住、行各方面均頗受困擾，當時臺灣大學留用日籍教授富田芳郎之妻富田奈美即感嘆物價騰貴，若買主食的話，半個月的薪水就沒有了，顯見生活窘迫之一斑。1946 年初，因治安漸亂、搶劫事件不斷，且米價暴漲，生活甚不安定，因此，日人多希望早日返國。7 月之後，更因物價持續上漲、待遇調整不公、薪餉時常拖欠、中國官員的遞補等，使日人逐漸喪失留用的實質意義；同時，因澀谷事件的發生，特務和警察對日人的監視加緊等，致使日人喪失生活的自信和安定感，紛紛提出立即遣返的要求，比率竟高達 90%。<sup>97</sup>

迨至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對在臺日人之留臺意願及國民政府的

<sup>95</sup> 〈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47。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記錄整理：《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9 年 6 月），頁 31。黃稱奇：《撐旗的時代》，頁 233-234。

<sup>96</sup> 葉曙：《閒話臺大四十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8 年），頁 96-97。

<sup>97</sup> 〈保護留用日僑〉，《臺灣省警察單位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74/1200。塩見俊二：《秘錄·終戰直後の臺灣—私の終戦日記》，頁 141-148。富澤繁：《臺灣終戦秘史—日本植民地時代とその終焉》（東京：いづみ出版株式會社，1984 年 6 月），頁 159。

留遣政策，均產生決定性的變化和影響。一者因是時臺灣亦面臨政治、經濟日漸惡化，通貨膨脹嚴重、社會治安混亂的情況，日人普遍陷入貧困，生活極不安定，日人們面對如此情境，漸萌「不如歸去」之感，均希望早日返回日本。另一方面，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臺灣之所以爆發二二八事件，完全是受到日本統治 51 年的緣故，致使臺人對於「祖國」既不親切更不熱愛，甚至懷念日本的統治，由是將滋事原因歸疚為「日人教育的結果」、「受了日本奴化教育的毒害」，<sup>98</sup>並決定提前完成在臺日人之遣返工作。

自事件爆發之初，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在臺日人即充滿疑忌，再三約束其不得涉入，日僑管理委員會則緊急通知在臺日人及其眷屬不得參加集會結社、擅離私宅及與他人交際，尤其不得批判此次事件甚至政治，並在自家門口掛上戶長姓名牌以茲識別，留用者須謹守規定等。<sup>99</sup>3月10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宣布戒嚴。是日，日僑管理委員會再度緊急通知留臺日人不得外出，並在私宅門口掛上戶長姓名牌以免誤會，倘不得已須外出，宜穿著整齊、攜帶身分證，萬一遇到憲警盤查，亦應沈著應付，依指示提示身分。17日，日僑管理委員會留用職員速水國彥特別函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留用日人均係已成熟且平素行動極其消極者、曾受高等教育而略知世界局勢者、多係農工科學技術人員無任何政治關係、多係被徵用不得已留臺工作者，絕不至於參與事件。<sup>100</sup>

21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在臺灣大學圖書館向留用日人講話，表示雖傳言事件中有少數日本浪人參加，惟其相信留用日人均係有相當地位、知識豐富之學者專家，絕未參與事件，況且其來臺前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日本的

<sup>98</sup> 〈重視教育文化工作〉，《臺灣新生報》，民國 36 年 3 月 22 日，社論。〈雪學生界之恥〉，《臺灣新生報》，民國 36 年 3 月 24 日，社論。

<sup>99</sup> 河原功監修、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 5 卷，頁 113-118。

<sup>100</sup> 河原功監修、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 5 卷，頁 16-27、132-152、179-180。薛月順等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12 月），頁 40-43。歐素瑛、李文玉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七)》（臺北：國史館，民國 91 年 6 月），頁 210-211。

廣播局呼籲臺人不可作亂，應服從中國政府，足見日本與此次事件無關。臺灣大學理學院留用日籍教授日比野信一代表致謝辭，除讚揚白氏識見高超、理解深刻外，並請求儘速發下留用日人的家族扶養金、讓有意返國者於適當時機遣返回國。22日，日僑管理委員會通知各機關留用日人佩帶機關證章及留用身分證恢復工作，並嚴加管理。<sup>101</sup>26日，臺灣大學正式復課，大學當局除規定教職員工出入校門應佩掛證章或身分證外，亦要求各單位儘速發給日籍人員留用身分證，以便通行。<sup>102</sup>

由上述種種跡象顯示，在臺日人參與二二八事件之可能性並不高，但是國民政府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方面卻不如此認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行政長官陳儀即電呈蔣中正，詳報臺灣二二八事件之經過，在原因分析中指出，除了海南島歸來臺人、日本時代御用紳士、共黨分子等對民眾之煽惑外，「留用日本人中，亦有想乘機擾亂者，此次事情發生後，日人中竟有著和服在街上行走者，可以推見其用意」。未久，又以「此次事變發生，日僑中有參加者，有特衣和服在街上行走，表示可不致被毆者，有勸外省人避居其家，隱然以保護者自居，似此情形其為患已甚顯著。現為清除日人遺毒，消滅叛國隱患，計所有工廠及臺灣大學留用之日僑，擬於4月底以前全部遣送，不留一人」。另，閩臺監察使楊亮功亦以「日本投降後，留臺之日人及以冒用臺胞籍貫之日人為數甚多，不斷暗中予臺人以煽動挑剔，以此種種日人餘毒之遺留未盡，其惡劣影響自不難想見矣」。由是建議將所有留用日籍人員「宜悉遣回，以絕後患」。<sup>103</sup>

1949年初，傅斯年接任臺灣大學校長後，曾召集校內之留用日籍教授

<sup>101</sup> 〈徵用日籍員工有關案卷〉，《臺灣省臺中市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419/066-5。河原功監修、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第7卷，頁23-25、151-164。

<sup>102</sup> 〈臺灣大學法學院布告〉，《國立臺灣大學檔案》，檔案管理局藏，檔號：36/9999/18/1/002、36/9999/12/1/001。〈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灣大學藏，檔號：347。

<sup>103</sup> 《福建臺灣監察區監察使署有歷史性史料》，中研院近史所藏，頁54-55、84-92。楊亮功、何漢文，〈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書〉，《世界日報》，1988年3月11日，版6、7。

聚會，以流暢的英語懇切表達大學當局希望日籍教授繼續留校服務的意思，惟是時日籍教授們的心中卻想著早日返回日本，除欲結束寄人籬下的日子外，部分教授亦恐怕留臺愈久，返日後難覓合適教職，由是紛紛提出解除留用或辭職返國案，但是大學當局仍希望能長期留用部分日籍教授，僅同意其以請假的方式返國。直至省民政廳函告臺灣大學，無法再留用日籍教授，大學當局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勉強同意解除留用，並於是年年底遣返回日本。<sup>104</sup>換言之，戰爭結束之初有超過半數的在臺日人希望留臺的情況，自 1945 年底以降發生重大轉變，希望返國者漸次增加，至 1947 年初二二八事件的爆發達於頂點，絕大多數日人無不感到失望和不安，均希望早日返國。而國民政府則以臺人深受日人遺毒及日人鼓動、煽惑二二八事件為由，提前完成在臺日人之遣返工作，藉此徹底去除日人對臺灣之影響。事件後，日人對臺灣之影響已是微乎其微，臺灣大學之留用日籍教授亦多埋首於校園內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並多於 1949 年底遣返回日本。

## 陸、結論

戰後初期臺灣正處於青黃不接、新舊交替的過渡階段，對於教育事業，無論在學制、師資、課程、教材及學術研究等方面，均為一極重要之轉變時期。臺灣大學是臺灣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設施，其前身為 1928 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為一所兼具殖民性和近代性的殖民地大學、國策大學。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後，國民政府隨即來臺進行接收，在日人的充分配合及臺籍教職員的協助下，接收工作頗為迅速而順利，學校組織和制度依「中國化」的目標，完全改易中國體制，逐漸由日式的研究型大學轉變為美式的教學研究型大學，不論形式上或精神上均產生實質的改變。

<sup>104</sup> 〈會議紀錄〉，《臺大校刊》，第 26 期（民國 38 年 3 月 20 日），版 2、3。〈會議紀錄〉，《臺大校刊》，第 28 期（民國 38 年 4 月 20 日），版 3。國分直一：〈「國分先生行狀繪卷」時代回顧〉，《臺灣考古誌》，頁 375-380。



然而，臺灣大學自接收開課以來，短短三年光景即三易其長，以一研究學術之最高學府而言，人事之動盪頗令人側目。就人論事，羅宗洛、陸志鴻、莊長恭皆係代表性學者，接掌臺灣大學可謂深慶得人，惟因內、外在諸條件之限制，或工作不得施展，或環境不如意料，以致匆匆就職，匆匆卸職，未能有所建樹。就外在條件觀之，非但教育部對臺灣大學未盡培植之責，即省府當局亦不夠尊重臺灣大學和扶助臺灣大學，以致經費困難、連繫困難，甚至聘請教授、安排校務亦受牽制，在在均使得臺灣大學無法順利發展。<sup>105</sup>迨至傅斯年繼長臺灣大學後，學校的相關組織和制度始告建制完成，校務運作逐漸邁入正軌。

在師資任用上，在臺人資格多有不符及中國大陸學者不願來臺的情況下，不得不留用部分日籍師資，以維持教學、研究於不綴，實有其現實上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因此，儘管校、內外之質疑聲不斷，大學當局仍能真誠相待，頗有助於學校人事的安定。同時，留用日籍師資於留用期間仍持續不斷地進行教學、研究工作，並未因戰爭結束或政權改易而受到影響。其中，考古人類學研究即以日治時期累積之研究成果，從事進一步的挖掘和研究，強化其初步推論的正確性，並將其研究觸角延伸至官方修史及民間報刊等方面，對於相關研究工作之延續和發展實有其貢獻。1949年8月以後，隨著考古人類學系的創設及中研院史語所學者的加入，納入民國初年以來考古學、民族學研究成果和傳統，由是激盪出不同的火花和研究課題，臺灣的考古人類學研究亦隨之進入另一個嶄新的階段。

臺灣大學留用的日籍師資是少數免於遣返的特例，在大多數在臺日人遣返回國後，仍有部分日籍教授留在臺灣，最初猶且感到慶幸。然而隨著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情勢的日趨惡化，尤其二二八事件後，日籍師資們多萌生「不如歸去」之感，希望能儘速返回日本。惟是時臺灣大學因學生人數暴增，師荒問題未見明顯改善，日籍師資之福利待遇亦未明確規範，連校長亦數度更易，校務運作遲遲無法邁入正軌。迨至1949年傅斯年接掌

<sup>105</sup> 〈與傅校長論發展臺大〉，《公論報》，民國38年1月21日，社論。

臺灣大學，隨著整體大環境的改變，有大批的學者、專家來臺，並獲聘為臺灣大學教授，師資結構和質量始出現根本性的改變，而日籍師資在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紛於是年年底返回日本，結束其在臺之教學、研究工作。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史料彙編

《臺灣大學校史檔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藏）

- 232，〈教員工作調查表〉。
- 236，〈授業關係書類〉。
- 239，〈華南人文研究所：發令通知簿、通知關係書類〉。
- 242，〈華南人文研究所：薪俸生活津貼書類、所得稅關係書類、米貼關係書類〉。
- 244，〈南方人文研究所：證明書控綴〉。
- 254，〈南方人文研究所：參考書綴〉。
- 258，〈南方人文研究所：統計報告〉。
- 261，〈教務關係書類〉。
- 322，〈文政學院會計往復書類、豫算關係書類〉。
- 326，〈文政學院廳用備品關係書類〉。
- 327，〈文政學院歸還關係書類〉。
- 332，〈文學院總務會議關係書類〉。
- 336，〈文學院教務關係書類〉。
- 339-01，〈文學院人事函件〉。
- 343，〈文學院學術研究補助費書類〉。
- 345，〈文學院通知函件〉。

346，〈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

347，〈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

348，〈文學院通知關係書類〉。

《行政院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062/1501，〈設立國立臺灣大學案〉。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449/095，〈殘留日僑集中遣送實施辦法〉。

449/123，〈殘餘日僑集中遣送辦法〉。

474/1267-1，〈日僑管理案〉。

《臺灣省警察單位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474/1200，〈保護留用日僑〉。

474/1270-2，〈日僑管理〉。

474/1262-2、14，〈日僑規避回籍〉。

《臺灣省臺中市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419/066-1，〈徵用日籍員工有關案卷〉。

419/066-5、6，〈徵用日籍員工有關案卷〉。

419/073，〈留用日籍職員薪津支給卷〉。

《傅斯年檔案》（臺北中研院史語所藏）

II：120，〈魏建功先生致傅先生函〉。

## (二)期刊、報紙、公報

《人民導報》，民國 35 年。

《中央日報》，民國 38 年。

《中華日報》，民國 38 年。

《公論報》，民國 37、38 年。

《民報》，民國 34、35 年。

《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1 期（民國 42 年 5 月）。

- 《臺大校刊》，民國 36 至 38 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民國 34 年。  
《臺灣省政府公報》，民國 37 年。  
《臺灣新生報》，民國 34 至 38 年。

### (三) 專書

- 日本大藏省管理局編，《日本の海外活動に關する歴史的調査》。東京：編者，昭和 22 年。
- 朱昭陽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風雨延平出清流》。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
- 吳文星、陳舜芬等，《亞洲大學的發展－從依賴到自主》。臺北：師大書苑，民國 79 年。
- 吳密察，《臺灣近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民國 83 年 3 月。
- 杜聰明，《回憶錄》。臺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民國 71 年 8 月。
-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第 2 輯。臺北：高雄醫學院杜聰明博士獎學金委員會，民國 53 年 6 月 16 日。
- 松本巍著，蒯通林譯，《臺北帝國大學沿革史》。臺北：譯者，民國 49 年。
- 松本もと志，《松本巍》。臺北：精華印書館，1975 年。
- 河原功監修、編集，《臺灣引揚・留用記錄》。東京：ゆまに書房，平成 9 年 9 月。
-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臺灣考古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 年 10 月。
- 南方土俗學會編，《南方土俗》。臺北：東方文化書局，民國 61 年復刊。
- 宮本延人口述，宋文薰、連照美翻譯、編輯，《我的臺灣紀行》。臺北：南天書局，民國 87 年。
- 宮本延人著，魏桂邦譯，《臺灣的原住民族》。臺中：晨星出版社，民國 81 年。

- 馬淵東一，《馬淵東一著作集》。東京：株式會社社會思想社，昭和 49 年 9 月。
- 國分直一，《臺灣考古民族誌》。東京：株式會社開明堂，昭和 56 年 2 月。
- 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錄》。臺北：編者，民國 40 年 1 月。
- 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概況》。臺北：編者，民國 36 年 4 月。
- 國立臺灣大學編，《國立臺灣大學概況－四十五學年度》。臺北：編者，民國 45 年。
- 國立臺灣大學編，《接收臺北帝國大學報告書》。臺北：編者，民國 34 年 12 月。
- 教育部參事室編，《教育法令》。上海：中華書局，民國 36 年 7 月。
- 教育部編，《教育法令》。臺北：正中書局，民國 51 年 1 月，臺四版。
- 曹永和總編輯，《臺北帝大的生活》。臺北：臺灣大學，1999 年。
- 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記錄，《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91 年 4 月。
- 陳奇祿，《臺灣土著文化研究》。臺北：聯經，民國 81 年。
- 陳奇祿口述，陳怡真撰，《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4 年。
- 陳明哲編，《榮耀與分享：臺大創校六十週年特刊》。臺北：臺大創校六十大慶籌備會，民國 77 年 11 月 15 日。
- 富澤繁，《臺灣終戰秘史－日本植民地時代とその終焉》。東京：いずみ出版株式會社，1984 年 6 月。
- 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年 1 月。
- 黃宗甄，《羅宗洛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 年 4 月。
- 黃稱奇，《撐旗的時代》。臺北：悅聖出版社，民國 90 年 10 月。
- 熊秉真、江東亮訪問，鄭麗榕記錄整理，《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臺北：

- 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79 年 6 月。
-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編，《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東京：株式會社凱風社，1988 年 12 月復刻。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一卷 10 光復志》。臺北：編者，民國 41 年 6 月。
- 臺灣省日僑管理委員會祕書室編，《臺灣省日僑管理法令輯要》。臺北：編者，民國 35 年 3 月。
-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編，《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臺中：編者，民國 74 年 4 月。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祕書處編，《臺灣民政》，第 1 輯。臺北：編者，民國 35 年 4 月。
- 臺灣省參議會祕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特輯》。臺北：編者，民國 35 年 5 月。
- 歐素瑛、李文玉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七)》。臺北：國史館，民國 91 年 6 月。
- 薛月順等編，《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料彙編(一)－從戒嚴到解嚴》。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12 月。
- 羅宗洛，《羅宗洛回憶錄》。上海：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2003 年。
- 塩見俊二，《秘錄・終戰直後の臺灣－私の終戦日記》。高知：高知新聞社，昭和 55 年 3 月。

#### (四)期刊論文

- 吳文星，〈日治初期日人對臺灣史研究之展開〉，《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民國 87 年。
-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的高等教育〉，《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25 期（民國 82 年 9 月）。

-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和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黃富三等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年。
- 李東華，〈光復初期的臺大文學院（1945-1950）－羅宗洛接收時期〉，收入周樑楷編，《結網二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7月。
- 李東華，〈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孟真先生在臺大〉，《臺大歷史學報》，第20期（民國85年11月）。
- 所澤潤，〈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の成立と組織の繼承－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からの連続性を探る〉，《東洋文化研究》，第2號（2000年）。
- 邱景墩、陳昭如，〈戰前日本的帝國大學制度與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1996年4月）。
- 張美惠，〈金關丈夫氏と『民俗臺灣』と臺北帝大と〉，《日本歷史》，第595號（1997年12月）。
- 許進發，〈移川子之藏與臺灣人類學的奠基〉，《二十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學術討論會》。臺北：國史館，民國91年。
- 許進發，〈臺北帝國大學的南方研究〉，《臺灣風物》，49卷3期（民國88年9月）。
- 曾士榮，〈戰後臺灣之文化重編與族群關係－兼以「臺灣大學」為討論例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6月。
- 黃英哲，〈許壽裳與臺灣（1946-48）〉，見陳琰玉、胡慧玲編，《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1991年。
- 黃英哲，〈臺灣省編譯館研究（1946.8-1947.5）：陳儀政府臺灣文化重編機構研究之一〉，見張炎憲、陳美蓉、楊雅惠編，《二二八事件研究論文集》。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8年。
- 黃得時，〈從臺北帝國大學設立到國立臺灣大學現況〉，《臺灣文獻》，26卷4期、27卷1期合刊（民國67年3月）。
- 歐素瑛，〈戰後初期在臺日人之遣返〉，《國史館學術集刊》，第3期（2003

年 9 月)。

鄭政誠，〈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1896-192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 7 月。

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4 月。